

知識天地

華人孝道信念的心理意義與功能知多少？

葉光輝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提到華人孝道觀念，許多人直接聯想的是元代郭居敬所編錄的「二十四孝」，但其書中收錄的某些孝子故事內容(如：臥冰求鯉、單衣順母)，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已屬於愚孝或不合時宜的孝道表現，應該加以摒除。確實，此類愚孝的觀念內容對現代青少年的身心適應發展可能造成負面影響，也是民初五四時期一些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所批判的主要對象。但是仔細思考，如果華人的孝道觀念只會帶來負面的功能與效果，那麼為何至今它還能存留在華人家庭中持續作為規範親子互動的重要德行與標準，而未被徹底揚棄？甚至現今每年內政部仍舉辦「全國孝行楷模」獎，教育部也有所謂「孝親家庭楷模」獎的選拔活動；這不得不讓人欲進一步探索孝道信念在華人社會下對於民眾的心理意義及運作功能。

孝道作為華人社會極具特色的文化現象，向來深刻影響人們日常的心理與行為。它的重要性可同時由文化與心理兩層面的相互型塑角度來加以瞭解：其中，孝道的文化原型主要是奠基於華人以家族為本位的生活適應策略，而孝道的心理原型主要根植於親子間對於自然親情的基本心理需求。進一步來說，前者乃早期華人社會為鞏固家族整合與延續以滿足務農社會的生計需求(如農忙或收穫時需要較多的勞動人力以應付工作所需，家族成員間的整體凝聚力相對更形重要)，因此透過將家庭日常對人際互動要求與其經濟功能緊密聯結，孝道規範遂逐漸從生活經驗中演化成形，藉以促進家族體系的團結及繁衍；同時在人為的政治力量作用下，又結合了儒家特定的倫理階序觀與忠君觀念，將之強化為孝道規範的行為細則，使孝道意識型態從繁複細緻的文化設計進而成為個人首要的生活德性。至於孝道的心理原型，乃是個體為滿足親密情感與安全依附的基本心理需求，藉由親子間頻繁的親密互動交流來加以達成；是以當個體在實踐孝道對親情規範的要求時，它同時也滿足了人們對於親密情感與安全依附的心理需求。家庭原就是個人社會生活之起點與核心，亦是彼此情感支持與社會教化歷程的主要來源，華人社會透過對孝道信念的教化與親子互動規範的實踐，這過程不僅對代間關係造成直接影響，還擴及到對個體性格、價值觀念、身心適應等層面發展的作用；復以孝道觀念在華人社會中隨社會教化歷程泛化至其他人際生活範疇，其作用效果更遍及到各種不同面向的社會心理與行為。因此，在華人的日常生活與心理行為中，與孝道相關的議題探討皆具有特殊價值。

然而，有趣但卻值得關注的是，在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論述或學術研究的實徵結果中，長久以來一直同時存在著對孝道信念正、反兩面的評價。許多廣受關注的社會議題，諸如：老人安養與居住安排、子代爭取婚姻與工作自主權、婦女外出就業、婆媳問題、對家暴或不適任父母的介入處理，乃至對孝悌楷模兒童之親職化行為的討論等，在社會輿論中往往呈現出兩種僵持不下的對立論點，無法達成共識。例如，在爭議中總不乏倡導敬老尊親的呼聲，極力宣揚孝道的倫理道德價值，認為子女對親恩的體恤、回報，一方面是人心善性光輝的寫照，另一方面也可減低人際間許多無謂的爭端或問題；但在現代民主社會環境下，鼓吹自我實現的聲浪也時時出現與之相抗衡，並認為強調以父母或家庭福祉優先的孝道觀念，不僅阻礙了個人自主性與自我實踐的發展，亦造成子代在孝道困境中蒙受沉重壓力，甚至是導致子女身心問題行為的重要根源。實際上，當回顧過往學術相關議題的實徵研究結果，它們也同時反映出，持有的孝道信念愈高對個人的身心適應發展是分別具有正、負向效果的證據。其中，孝道的正向效果主要展現在對個人的社會互動、代間關係等方面之助益，至於孝道的負向效果，則與個體的僵化性格與認知發展有關，它易使個體表現出較為壓抑服從、保守與缺乏彈性等性格特質。上述孝道效果相互衝突的爭議觀點，各自有其角色立場與理論依據，突顯了孝道在日常生活運作與學術研究概念意涵上的複雜性，若欲突破此種各執一詞的窘境，必須對這些孝道理論概念內涵加以釐清，方能從更具整合性的解釋架構來消解這些爭議。

晚近，筆者在兼顧社會科學者對孝道的定義及測量構面，與人文學者對孝道意義之歷史演變的追溯探討下，提出

所謂「孝道雙元模型」主張，寄望透過釐清華人孝道內涵至少包含「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面向，而這兩種孝道面向所涵括的特徵屬性與心理運作功能有所差別與區隔，用以取代過往慣常使用籠統概括概念來稱呼孝道，以幫助闡明及化解為何過往對孝道效果議題存在著正、反兩極評價的困境。

雙元孝道模型中的「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不僅可分別對應到不同歷史階段時期所倡導之「相對主義觀」與「絕對主義觀」的孝道觀念，其背後所強調的親子互動精神，亦同時反映出儒家思想所標舉的兩大倫理核心--「親親」與「尊尊」原則。其中，「相互性」孝道信念之運作模式是依循儒家思想之「報」與「親親」原則，其行為動力是來自人性中的善良情感本質，反映著根植於親子間對自然情感的基本需求，可視為是孝道信念發展的心理原型；而「權威性」孝道信念之運作模式則依循儒家思想的「尊尊原則」，其行為動力是來自對倫理階序與權威的順服，反映著華人社會為鞏固家族體系的整合與延續以適應生態環境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制度，可視為是孝道信念發展的文化原型。從子女的角度來說，雖然兩種孝道信念與其他規範一樣，都具有規約子女行為的功效，然一般而言：子女的相互性孝道信念是一種屬於主動自願的、跨情境式的、作用力強的、具文化普同性、以及偏向正面功能的規範信念；相對而言，子女的權威性孝道信念會是一種屬於被動壓抑的、具文化與情境特殊性的、作用力較弱的、以及偏向負面功能的規範信念。當探討孝道有關的議題時，若能同時兼顧上述孝道特徵的雙元面向，並分別探討其各自面向對個體身心適應發展的影響效果，則不僅可用以整合既往以概括孝道概念探討對個體身心發展之影響時，得到正、反作用效果不一結果的爭議，而且也可以更深入、貼切地瞭解不同孝道信念如何影響個人日常心理與行為的實際運作過程，進而對既往及未來研究結果之解釋與應用產生更大的理解與助益。

目前雙元孝道模型的主張觀點已應用至親子衝突、青少年問題行為、老人安養、代間交換、婆媳議題、親子家暴、以及文化諮商處遇實務等相關議題上，並累積一系列實徵研究成果；它不僅在理論模型與測量工具的信、效度皆獲致持續驗證，其兼具整合力與解釋力之特色與優勢，也值得後續研究者引用此觀點作為孝道議題研究的基調，以作為對相關現象的詮釋。曾有學者指出「重老的社會才可能重孝」，然而「重老」這項促成孝道在華人社會發展的本土倫理特徵，隨著現今全球人口結構高齡化現象，已逐漸成為全球普遍的趨勢。因此，孝道議題研究不僅在華人或東方集體主義社會中持續有所進展，在西方個體主義文化中也方興未艾；為了由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之外的途徑以解決老年安養問題，孝道相關概念在西方的家庭與成年人親子關係研究中已開始廣受重視。從雙元孝道模型累積的實徵研究結果，已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華人傳統的孝道概念是具有多元面向的，其中部分面向的孝道信念已經不是那麼符合現代台灣社會的文化思潮，例如權威面向的孝道觀念，它雖然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仍有正面功能與效用，但不應該再特別地加以強調；然而還有其他面向的孝道信念，相對上較具有跨文化普同性，且能透過日常生活互動，在世代傳承中歷久彌新，例如強調親慈子孝的相互性孝道觀念，它更適合作為當前孝道社會教化的倡導重點，以促進現代少子化家庭中健康的親子關係，營造出跨世代交流的共享社會。

